



袖珍经典

权力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瞿铁鹏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权力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瞿铁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 / [德] 卢曼著; 瞿铁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036-8

I. 权... II. ①卢...②瞿... III. 权力—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216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 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权 力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瞿铁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965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4

字 数 121,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036-8/C·168

定 价 15.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序言_____1

第一章 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_____5

第二章 行动关系_____21

第三章 代码的功能_____34

第四章 权力与物质暴力_____65

第五章 生活世界与技术_____76

第六章 影响的普遍化_____80

第七章 权力的风险_____88

第八章 权力与社会的关联_____98

第九章 组织的权力_____106

参考文献_____125

索引_____145

序 言 ¹

许多人已经用概念表述权力现象，尽管他们有分歧，但都试图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取得成功。面对这种情境，权力理论本身不可能满足于描述性陈述和本质分析。这种分析或多或少假定，确实包含它引起的后果。即便这些尝试分析概念本身，且与它的不同含义妥协，但除了偏向于谨慎从事和彻底放弃外，没有使我们进一步屈从。在这种情境里，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行事，即便在提出关于权力是什么的假说时也是如此。相反，我们必须努力使用一般性概念，它们在其他地方也适用，而且可能转而用来尝试和检验问题的提法和概念构成，有助于比较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

如果我们期待这种开端，那么我们首先发现这种概念：权力是针对可能的抵抗所引起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是反向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在交换论和博弈论中发现当前的概念，这两种理论强调过程的可计算方面，过程仍然是在因果关系范围内设想出来的，但富于选择

性。^[1]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走不同的路径。

考察这种概念构成的可能性，首先直接根据它们的逻辑相关性，根据它们提供证明的可能性，根据测量中各种困难，最后，根据它们概念假定。^[2]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已导致权力理论的分裂而不是导致其团结。这似乎是对一种孤立现象过分仓促的理论化所带来的后果。

换言之，人们可能利用构造社会学问题的（自涂尔干以来被证实有价值的）技术，以便揭示成为制度基础的基本假定，对此已有现成的解释和理解。人们可能要问：如果权力不得不是因果过程，那么因果关系的非因果基础在哪里？如果权力被看作交换，那么有没有对交换而言的非交换的基础？如果权力是对立者之间的博弈，那么博弈的非博弈基础是什么？这种提问技术反过来涉及权力可能性条件的社会，而且要借助社会理论间接地探索权力理论。

我们在下面采纳的正是这种间接的研究。我们要考察特殊的宏观社会学参照系统，即全面的社会系统，而且我们首先要问：在这个层面上权力形成的功能是什么？^[3]这并不排除求助于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可能性。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把符号普遍化的成就视为当然，符号普遍化不可能由个别的互动案例产生，而只能由整个社会产生，例如法律的发展。首先，就社会体系层面的这类分析而言，我们可以超越单纯把权力叫做社会事实的

[1] 例如，参阅哈萨尼 (Harsanyi, 1962a, 1962b)，也参阅特德西、博诺玛和布朗 (Tedeschi, Bonoma, Brown, 1971)，鲍德温 (Baldwin, 1971c)，以及博诺玛、特德西和林德施科尔德 (Bonoma, Tedeschi, Lindskold, 1972)。

[2] 例如，参阅里克 (Riker, 1964)，丹齐格 (Danzger, 1964)，马尔希 (March, 1966)，弗龙 (Wrong, 1968) 或卢曼 (Luhmann, 1969b)。

[3] 莱曼 (Lehmann, 1969) 尤其强调以这种方式提问的意义。

“社会”的表现或因变量，并利用当前社会理论所用的三种不同的、但可整合的概念，这就是：(1) 系统形成和系统分化理论；(2) 演化理论；和 (3) 有关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的尝试性理论。这些理论的对象在系统形成的社会层面上必须被看作是相互依赖的，这是因为社会演化导致更大、更复杂和更强有力分化的社会系统。为了渡过这种更大程度上的分化，这些系统发展出更高程度普遍化的、同时更高程度专门化的交往媒介，而且在社会方面与这些媒介相协调，发展出更有意义的子系统。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进一步阐述这种关系。我们目前的一部分任务在于阐明，当权力被看作是普遍化的交往媒介时，当对权力分析以这种方式置于广泛的社会理论背景中时，这意味着什么。 3

第一章

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 4

把交往媒介理论作为权力理论的基础有这样的优点：使人们有可能把权力与不同种类的交往媒介作比较，使用同一的组合问题——例如，将它与真理，或与货币相比较。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澄清权力现象，同时还有助于产生更广泛取向的比较兴趣，并促进不同媒介领域的理论见解的交流。除此之外，权力理论还获得一种普通视角，透视各种影响形式，一旦有局限的权力概念被超越，它们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有可能避免人们经常议论的，那种权力概念负荷太多十分广泛且松散界定的影响过程的各种属性。^[1]

因此，为介绍起见，我们有必要对交往媒介理论作一些简略的评论。^[2]

[1] 社会心理学特别冒此风险。典型的例子会是：雷文 (Raven, 1965)，和克拉克 (Clark, 1965)。

[2] 把权力专门看作是交往媒介起始于帕森斯 (Parsons, 1963a)。其他的建议、应用和批评，参阅查泽尔 (Chazel, 1964)，米切尔 (Mitchell, 1967)，莱斯

1. 按照起源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要素，社会理论，一方面是社会分化为社会阶层与功能子系统的理论，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演化的理论。在这个论题上有关系的两个开端上，社会—文化演化导致日益增长的分化。根据这种参照框架，交往问题、接受和完成交往的动机激发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得到阐明。在某些方面，它们被看作是单纯的心理行为并被归属于个人；在某些宏观社会学的思考方法方面，它们被列入专门的概念：诸如共识、合法性、非正式组织、大众传播以及带来的类似概念等等。两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在比较分化和演化概念时，引出不太有序、范围多有局限的概念。因此，交往和动机激发问题没有完全从社会理论中排除出去，但是它们没有与主要概念并列。与此相反，人们可能以假定的人类兴趣为名提出观点，哀叹人性的丧失，但获得的不过是在完全不适当的层面上的抗议。^[1]
- 5

阐述有关符号普遍化交往的普通理论的尝试，把它与社会分化概念相联系，与有关社会—文化演化机制和阶段的陈述相联系，旨在弥合这种分歧。因此，我们意在避免诉诸“主体”，如超验哲学已用该术语那样，也避免研究有机体的一心理学的具体个人的要求。对社会理论来说，第一种抉择太抽象了，第二种抉择太具体了。^[2]相反，就如我们将从下述基本假定出发，即社会系统总是通过交往

诺夫 (Lessnoff, 1968)，吉登斯 (Giddens, 1968)，特纳 (Turner, 1968)，也参阅鲍德温 (Baldwin, 1971a) 和布莱恩 (Blain, 1971)。下面交往媒介概念的使用方式不依赖帕森斯的交换范式；因此它不是建立在交换概念上的，而且也与帕森斯概念的其他方面不同。差异在于对偶然性问题的解释，在我的论文“泛化的媒介和偶然性问题”中得到说明，该论文为《帕森斯纪念文集》而作。

[1] 例如，参阅霍曼斯 (Homans, 1964) 和马切耶夫斯基 (Maciejewski, 1972)。

[2] 这个陈述同时旨在表明把个体指定为主体是多么成问题。有这种含糊不清的含义，它就变得太容易了，以致不能从抽象走到具体。

形成的，换句话说，它们总是假定，借助预见或创造多种选择过程相互决定。社会系统首先产生于对协商选择的需要，就像另一方面，这种需要首先是在社会系统内被体验到的。使这种相互关联成为可能的条件是演化和与它相伴的变迁的结果。就如演化联结时间，分化联结物质，所以，交往联结社会系统的社会维度。

交往只有在人们理解了信息选择时才发生，这就是说，如果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系统状态时利用信息它才发生。^[1]这意味着两方面的偶发性，因而也意味着有可能拒绝交往的传播所提供的选择。这些拒绝的可能性不可能作为可能性被根除。反过来，交往中的拒绝，而且那种成为社会系统内一个主体的拒绝，是与冲突一致的，正是冲突潜力实现的程度依系统分化程度，以及社会演化程度而变化。

在这种构造条件下，“是”或“否”的选择不可能单独由语言指导，因为恰恰是语言保证两种可能性（Möglichkeiten），两者都不可能留给偶然事件。因此，除了语言之外，在任何社会，都有各种手段来保证选择性能的传播达到合适的程度。正因对此有需要，这些手段才增长了，它们的形式也随社会系统的演化而变化。在简单社会，主要由以共享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现实的构造”来完成这些功能，现实构造是交往过程的基础，人们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2]在很大程度上，语言进一步确认这种理所当然性，它的报道和拒绝潜力并没有被穷尽。^[3]只有在较发达的社会，才产生了分化的需要，一般的语言

[1] 关于这种交往概念，参阅马凯（Mackay, 1969）。

[2] 参阅贝格尔和卢克曼（Bergern, Luckmann, 1969），麦克莱奥迪和夏菲（McLeod, Chaffee, 1972），此外还有比勒费尔德社会学工作小组（1973年）。

[3] 例如，参阅马歇尔（B.Marshall, 1961）。

代码与专门的、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如权力或真理的分化，它们尤其制约和调节采纳已备选择的动机。借助于这种分化，社会中的冲突和同意的潜力不可能协调一致地扩展。改变和选择可用的、社会有效的、可迁移选择的演化机制，分离开来，这就加速了社会文化的演化，因为在比较专门的观察视角内，从比较多的可能性中可以作出新的选择。

- 从历史上看，书写的发明与传播看来一直是专门的符号交往媒介发展的原因；书写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交往潜力，使它超出人们当前互动的范围，因而使它摆脱具体互动系统的控制。^[1]没有书写人们不可能创造政治和行政官僚制中的复杂权力结构，更不用说对政治权力的民主控制了。陶片放逐制度以书写为先决条件。同样，这适用于话语的发展和保留对真理陈述的比较复杂的阐述。^[2]只有当可以利用书写形式阐述思想财富时，逻辑上图式化的真理代码的分类功能才是必需的。但是，在古希腊城邦关于友谊和爱 (*philia*, *amicitia*) 的特殊代码的道德普遍化是对城邦书面文化的反应，对不可能再出现的邻里 (*philói*) 间密切互动的补偿。对书写的依赖最先恰好在货币代码上开始显现出来。只有经由书写而对语言进行解码，社会交往过程才从社会处境和理所当然假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为了从激发接受交往的积极性，特殊的代码不得不发明出来，同时，它们也成为人们所可能成功宣称和要求的条件。

2. 于是我用交往媒介意指语言的附加机制，换言之，指导选择传递的普遍化的符号代码。语言正常地保证主体

[1] 关于这一点，参阅古迪和瓦特 (Goody, Watt, 1963) 和古迪 (Goody, 1973)。

[2] “对话”因而被培养成文学形式、对文字要求的自我矛盾的抗议；而且正是以这种方式它取得风格的完善。

间理解，即承认他方的选择为选择，除此之外，交往媒介因此也具有激发动机的功能，因为它们促使人们接纳其他人的选择，而且通常使这种接纳成为期待的对象。因而，当伙伴一方的选择方式同时作为他方的动机结构起作用时，人们总是可以阐明交往媒介。这种选择和动机关系的象征因而取得传递的功能，而且使两方面的联系变得明显，所以这种预期的联系可能强化并且激发选择性。

这种概念包含一系列假定和含义，它们也适用于权力理论并引导它到特定的方向。

首要的假定是，媒介指导的交往过程把同伴联系起来，双方都知道他们自己的选择，也相互知道这一点。^[1]请允许我们使用“他人”和“自我”术语。全部交往媒介假定，两方面都有选择可能性的社会处境，换句话说，双边偶然选择的处境。这恰好给予这些交往媒介以功能，在保持它们的选择性同时，传递从他人到自我的选择。在此范围内，在全部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中，初始的问题是相同的；在此范围内，适用于爱或真理的，也适用于权力。在任何情况下，有影响力的交往与一个伙伴相联系，这个伙伴在做其选择时会受到引导。^[2]

根据这一点，选择的效率恰好意味着：在从这种初始背景中抽象出来的简单化条件中选择的生产。恰恰是有鉴于这种简化和抽象，有必要用符号取代具体的开端，选

[1] 帕森斯把双重偶然性理念作为互补期待形式的必要条件来使用而适应这一点。参阅帕森斯和希尔斯 (Parsons, Shils, 1951:14)；也参阅马赫和西蒙 (March, Simon, 1958:90) 引人注目地把权威界定为对其他人决策前提 (不是决定!) 的规定。

[2] 因此，在一般权力理论语境里，对任何一方的决策问题的片面强调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在特殊的权力领域，这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费希尔 (Fisher, 1969) 提出，外事局与其说关心自己政策的制定，不如说更关心其他国家，而且首先要弄明白，其他政府的什么决策在行使任何权力之前将是可接受的。

择链中的初始连结。为此目的，交往媒介为共享的志向发展出符号普遍化的代码。然而，过程的随后阶段本身仍然是选择。交往媒介随后把共同志向与选择的非同一性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基本的条件下，权力也作为交往媒介起作用。^[1]它以双重选择性安排社会处境。因此，他人的选择性必定与自我的选择性相区别，因为与这两种因素相关，尤其是在权力的案例里，不同的问题提出来了。

因此，所有权力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与掌握权力的他人选择相关而存在的不确定性。^[2]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人自己支配的不止一种抉择。当他实施自己的选择时，他可以生产和排除他伙伴方的不确定性。这种经由不确定性的生产和减少而产生的偏离，是权力的绝对先决条件；它决定为特殊交往媒介一般化和专门化而存在的活动空间——而且它不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权力资源。

- 就自我受权力影响而言，权力也以向其他可能的行动开放性为前提。权力实施其传播效能，能够在面对其他可能性时影响行动（或不行动）的抉择。如果即使在面对行动或不行动的有吸引力抉择时，权力仍能显示自己的威力，那么它的力量就越大。此外，就谁服从权力而言，它只能随同自由度的增长而增长。

因此，权力必须与强制去做什么具体、特定事情区别开来。对个人可能选择的强制降为零。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中，强制求助于物质暴力的使用，因而求助于使某人自己

[1] 艾布拉姆森，库特勒，考茨，门德尔松 (Abramson, Cutler, Kautz, Mendelson, 1958) 特别强调权力理论必须考虑到双方大部分可能的行动。

[2] 参阅克罗泽的观点 (Crozier, 1963, 特别是第193页)；在结构紧密的组织内，权力转换到那种地方，在那里与其他人所依赖的行动选择相联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残余。对于一般的关于权力的“策略偶然性理论”阐述，参阅彭宁斯及其他人 (Pennings et al. 1969)，希宁斯及其他人 (Hinings et al. 1974)。